

Benoît Peeters

ENTRETIENS AVEC ALAIN ROBBE-GRILLET



伯努瓦·皮特斯

罗伯-格里耶访谈录

姜丹丹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伯努瓦·皮特斯

罗伯 - 格里耶访谈录

姜丹丹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伯-格里耶访谈录 / (法) 皮特斯 (Peeters, B.) 著; 姜丹丹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404-7084-5

I. ①罗… II. ①皮… ②姜… III. ①格里耶(1922~2008) - 小说研究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060 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 图字 18-2014-212

罗伯-格里耶访谈录

著 者: 伯努瓦·皮特斯

译 者: 姜丹丹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张 璐 冯 博

装帧设计: CANTONBON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084-5

定 价: 2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Entretiens avec Alain Robbe-Grillet

© Les Impressions Nouvelles

Benoît Peeters, 2002

根据伯努瓦·皮特斯提供的文本翻译

并获中文版翻译出版授权

法文版版权：新印象出版社和伯努瓦·皮特斯，2002

目 录

导言	(1)
“我喜欢，我不喜欢”	(5)
访谈的悖论	(7)
《反复》	(11)
法兰西式的青年时代	(19)
一个作家的诞生	(47)
《弑君者》	(53)
《橡皮》	(59)
热罗姆·兰东与午夜出版社	(75)
《窥视者》	(81)
《为了一种新小说》	(87)
《嫉妒》	(97)
新小说的作家们	(99)
反巴尔扎克	(109)
《在迷宫里》	(115)
《幽会的房子》	(121)
哲学漫步	(129)
“传奇故事”	(135)
某一种文学理念	(139)
从新小说到新电影	(143)
《不朽的女人》	(153)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157)
回到《不朽的女人》	(171)
《横跨欧洲的快车》	(179)
《说谎的人》	(189)
《伊甸及其后》	(193)
其他电影	(205)
四月 10 日的特权	(219)

导 言

阿兰·罗伯-格里耶原本挺希望能活一百岁。无论如何，这是他在2001年春天告诉我的心愿，大家本来准备好了庆祝他的80岁生日。但他当时这样说，丝毫不是为了表示心境平和，丝毫不是为了做出平静泰然的老者姿态。他还在梦想着更好地发起挑衅：可他却不再有这种运气。

大约在15或16岁时，我开始读他的作品。他的一些小说，像《窥视者》或《在迷宫里》，既让我着迷，同时也抗拒我。《为了一种新小说》，既让我充满激情，同时也撼动了我有文学的大多数想法。在18岁那一年，我很系统地沉浸到他的作品世界里。那时候，我钦佩他的胆识，我钦佩他创造的力量，还有他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重新质疑自身的能力。他是最能激发起我的写作欲望的人之一，在1975年四月，我“不知害羞”地将自己的处女作献给他。几天之后，在位于贝尔纳-帕利西街的午夜出版社，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他第一次会面：他让我感到非常胆怯，也让我感到有趣。

阿兰·罗伯-格里耶愿意扮演恶龙或者魔鬼的角色。在《为了一种新小说》里，他发出一连串既有效、又过于简化的诅咒：叙事与人物都死了，正如他只用几页就和自然、人本主义以及悲剧都作了清算。但是，如果对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来说，罗伯-格里耶体现出对禁忌的粗暴违背，在他身上，我本人发现的却是一个思想敞开、充满好奇心的人。

在我对于所谓“现代性”的体会中，有一个因素起到了主要的作用：那就是1975年七月在诺曼底的塞里西-萨勒城堡举办的阿兰·罗伯-格里耶专题研讨会。在为期十天的产生碰撞与对峙的研讨里，戏剧性与理论性以密不可分的方式相糅合，而这次研讨会的令人惊讶的组织者是让·里卡尔杜，被研讨的生动的对象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作者，他庄严地端坐在讲演者后面的一张扶手椅上，他朝挤在图书馆大厅里的听众时不时地挤着眼睛，或带着嘲弄，打断演讲者：“不对啊，某某人，《嫉妒》的那座房子确实存在。”

如果说罗伯-格里耶带着不无变态的愉悦与论及他的作品的话语相游戏的话，那么，他也会在像我和我的朋友让-克里斯朵夫·康比亚这样的年轻人面前表现得平易近人。他强调让我们在饭桌上为他留一个位子，他对我们说，“离那些讨厌的人远些”，或者让我们陪他去散步。然而，当我们和他一起走路时，我们会记起，他曾经是农业技师，他会打断关于文学的谈话，引我们去留意一棵树或一株植物，说出其学名，而我们很快就忘记了那些渊博的名称。有这样一个悖论：那时候，人们不停地谈论“作者之死”，而他就在那里，整个人光芒四射：作者，散发着光彩。

后来，我们每隔好久才见一次面。我继续读他的书。2001年，我想要和他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并拍摄下来。他立刻接受了这个想法。我们称这一组为“回忆的游戏”，是在他心爱的诺曼底城拍摄的，就在法国当代出版纪念协会(IMEC)拍摄——他把与自己生命和作品相关的所有档案都存放在那里：照片、手稿、报纸文摘、通信……在那里，我们完全沐浴在他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尽管新小说有着严谨朴素的声誉，尽管他本人也在早期的随笔中宣告了一些禁忌），罗伯-格里耶并不是一个容易应付的对话者。我们的对话经常呈现出一种争辩的气势，而有时候，我又变成了在我们第一次

见面时的那个羞涩的大学生。在我们那间小小的剪辑室里，当我又见到他时，他强调要剪掉我在一段对话的结尾处所说的话。最终，他这样说明：“你明白，否则，人们会说，是你最后说了算。”当然，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个权利让给他。

他的笑容和挑衅已经让我思念。他的作品还将继续长时间地陪伴着我。

伯努瓦·皮特斯，2010年三月31日

“我喜欢，我不喜欢”

“我喜欢生活，我不喜欢死亡。但是，我十分喜爱那些始终静止不动的事物。我喜欢猫，不喜欢狗；我喜欢永恒的感觉，那些外观恒久不变的外省老宅邸，长久以来褪去了光泽的厚重红天鹅绒的窗帘，甬道上的青苔，在水池的两湾水间跳跃的鲤鱼。我不喜欢电话，我不喜欢汽车。我喜欢在铁路上坐火车做长时间的旅行，从巴黎到布加勒斯特，从纽约到洛杉矶，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我也喜欢走路，在大街上，或穿越田野。我喜欢湿润又温和的秋日，我喜欢棕褐色的叶片上闪烁着雨滴的微光，铺在路上的梦幻般的厚厚一层的落叶地毯。我不喜欢噪音，我不喜欢骚动，我喜欢美丽动听的声音，我不喜欢叫喊声。我喜欢快乐的人群，我不喜欢朝着人群大发抱怨的人。我对民间大众保持怀疑。我喜欢那些让我感到自己更聪明、更有教养、更敏锐的日子，我喜欢学习，我不喜欢教诲他人。我不喜欢在一顿美餐之后做一场讲座。我喜欢小女孩，尤其如果她们相貌姣好的话。我不太喜欢小男孩。我喜欢俊俏的，我不喜欢丑的时尚。我喜欢说我所想的，尤其如果还没有被说过。我喜欢了解规则，我不喜欢遵守规则。我喜欢了解各种理论，文学或科学的理论，我喜欢自由，我不喜欢浪费，我不喜欢记者们的胡说八道。我喜欢我的爸爸、妈妈。

我怀疑精神分析学家。我喜欢把人家惹恼，但我不喜欢别人惹我烦。”

阿兰·罗伯-格里耶

访谈的悖论

——那么，阿兰·罗伯-格里耶，您再一次面对一个采访者，这是您熟悉的一种情境，也是您许多次经历过的情境，被要求来回答一些千篇一律的问题，反复回到您在“传奇故事”里已经重述的一些事情上，这种讲话的情境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您是否是一个爱讲话的人呢？

——是的……我憎恶访谈，有如下几个理由：其一，如您所言，采访的问题总是千篇一律；刚开始时，我尝试着每一次给出不同的回答，可这全都没用，实际上，这行不通。另一方面，那些问题几乎总是笼统的。可我喜欢特别的问题。随后，我可以过渡到一些整体性的观点，一些概括性的见解，但是，当一个采访者对我说：“那么，阿兰·罗伯-格里耶先生，对还不太了解这一切的公众，请您向我们说明究竟什么是新小说吧。”这个问题显然让我不知所措，因为如果要做一个逻辑连贯、坚实稳固的回答，那会持续几个小时。另一方面，采访者经常需要相对简短的回答——因为他在为一家电视台、电台、或者甚至为急需出版的报纸工作。我事实上已经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了。我宁可以说：“您听好，您可以去查阅拉鲁斯字典，您会得到一个快捷、扼要、或许愚蠢的答案，但无论如何，那就是您所需要的全部回答。”从提问者的方面，特别的问题包含着一种知识：人们不能提出特别的问题，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知道

的话。

我不喜欢访谈的第二个理由在于：人们永远不知道采访者要对访谈做什么处理，他或许仅仅保留三行，或者保留一页……但在这里，因为我本人在一部摄影机前讲话，这已经是通常人们会避开的一座暗礁：您不会对图像做配音的加工，不会在我的嘴边上重叠上其他的话语——这是可以操作的，也是有趣的。

我对于访谈的疑虑还可以通过第三个理由来解释，也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我们生活在充斥着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的一种文明里。在当今时代，我们有一种小说家总是辞不达意的印象，而贝尔纳·比沃在电视上只通过几个狡黠、灵活的问题，就能使始终还藏在作者身上的一部作品可以分娩，而他需要采访小说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理念来自很远处，从最大范围上讲，它来自柏拉图。对我来说，这种态度可以证实一种整体的拒绝。而在文学里，有这些拒绝的范例。

——德·弗雷，布朗肖，格拉克……

——德·弗雷，布朗肖，格拉克。

此外，这三个人每个都有不同的拒绝的理由，然而，他们都是作家，因此，他们都从事写作；而如果他们让一些人感兴趣的话，只需让那些人去读他们的作品，因为，写作就是为了被阅读。这种态度令人难以忍受，只要人们终究还是对交流有兴趣的话。因为，我也许不是为公众而写作——我甚至说过，我写作，以反对公众，然而，我和公众一起写作。事实上，只有当书有读者、且读者为之思考时，它才算真正存在。说到底，作品只有在它被阅读时才存在。这种情形对电影来说更真实，因为，如果电影的胶片仅仅搁在卷筒里，仅仅放在电影资料馆的架子上，这些胶片就不再是电影，因为没有观众去观看。因

此，就需要有公众，需要有观众的在场、读者的参与，但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意识，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录制机器，这是布朗肖已经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格拉克来说，这个问题不那么确定。在格拉克那里，有某一种“高度”：他带着高度的姿态，就不会去回答。我讨厌这种态度。那么，从我个人的方面而言，我有一种立场，我不能说我比他更“宽容”——我的天性并不宽容——我却比他更敞开。此外，您看，您向我提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就已经讲了五分钟，这也等于说，我相当喜欢尝试着表达自己。

我还想补充一点：有意思的是，去看看人们对一个文本的评论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是有趣的，因为，格拉克的高姿态意味着某一种怀疑：任何评论，甚至是为作者而做的评论，尤其是作者本人的评论，都将使文本发生变质。文本本身的“光彩”不需要评论，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显然的。这也许有点贝克特的立场。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更复杂。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或电影，在原则上，不需要评论。在原则上。作品在那里，它被创作出来，为了被阅读、被观看，由读者或观众来重新激活，却如原样被重新激活。而在这种立场里，或许有不愿冒险的一种拒绝。谈论本人的作品，是一种风险。

——仿佛这会玷污作品……

——完全正确。仿佛这会玷污作品，让它变形或缩减它的价值。我呢，我会去冒这个险，我有兴趣去冒这个风险，此外，我很早就冒过险了，因为，我撰写过评论，评论过我的朋友们、敌人们和我自己的作品。后来，这些文字化成了一本书：《为了一种新小说》；我之所以冒这个险，不是为了解释文学，而是为了看看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经得住解释。我甚至还在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里成为了“讲我本人的教授”。我带着一种愉悦，

为自己过去的作品重新赋予意义（对于我近年来的小说，我不会这样做）。此外，在许多年里，我围绕《嫉妒》那本书讲课，在一些大学里学生们非常喜欢。一年又一年过去，一本书可以发生演变：作品不会完全不受意义的影响，它会受到“某些”意义的影响，人们不能把它缩减为“一种”意义，但它可以受到一种意义效果的影响。因此，一年又一年，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赋予意义的途径重新进入作品，远远不是把作品贫瘠化，而是为了使作品更丰富。

《反复》

——这一次，我们身处的情境与其他访谈的情境有所不同，由于某些符号与元素而尤其显得特别：不久，您将进入 80 岁高龄，我们在当代出版纪念协会，您把全部的档案存放到这个协会，因此，这里散发着一股非常特别的气氛，介于客观回忆与主观回忆之间……在今天的这个访谈的情境里，或许也因为时值您的小说《反复》刚刚出版，是否会让您感到这是一次回归，如同返归到先前作品的一种形式……

——最后这一点，对我来说尤其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我要严格地说，并非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做回归，这就是全部，从现在的时刻起，这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去做，因为现在要做——却是出于这种重要性的某种理性化，在此时此地，我要说，实际上，《反复》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在写完《科兰特的最后日子》之后，我曾经用强有力的高姿态宣布，我今后不写作了，而且，我的作品已经完结，我已经做了我想做的事，在我的作品里，有好几个时期，“传奇故事”会是最后一个阶段，而《科兰特的最后日子》会是最后一部小说。

那么，有些人就问：“怎么，您要停止写作了？怎么能停止写作呢？”可我完全可以去做写作以外的其他事。我有自己的生活，我对不少事情有兴趣：我时常旅行，我还得料理一座花园宅邸，哎，它先前惨遭一场暴风雨的蹂躏，但最终，我也同样